

云南跨境民族的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实证研究

——中越、中老、中缅边境的调查分析

李立纲、李永松、赵煜、李树燕等

摘要：跨境民族，其成员有着本民族的民族身份和本国国民的公民身份两种身份。本文对跨境民族这两种身份之关系的研究，是通过对其成员个体作调查进行的。具体分析和论证了日常生活互致力与民族身份和国家认同之间的消长关系。调查内容涉及跨境民族的基本情况、基本行为和基本态度。由此形成的数据，对跨跨境民族进行了一个较新视角的分析，并构成了社会学对跨境民族研究的理论框架。研究方法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并结合个案访谈进行。

关键词：跨境民族；民族身份；国家认同；实证方法

一、项目来源和基本调查设计

研究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自于“2008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特别项目”的“西南边疆研究项目”课题，课题名称：《边境居民的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对云南跨境民族的一项实证研究》（简称“跨境民族认同研究”）的调查。项目编号：A08008。

本文是一项国家特别项目即西南边疆项目的中期研究成果之一。项目数据的采集，通过调查问卷方式进行。调查问卷包含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行为和态度三个层面共 33 个问题。本文是对此课题调查结果的初步分析。仅选取了其中相关的几个问题的调查数据，结合部分访谈进行的分析。

“边境居民的国家认同问题”，是一个现实性的问题。以居住在边境线一带的中国居民作为特定的调查对象，对他们当中一个一个的个体，通过其日常生活、行为和基本态度三个方面的调查，来了解一个具体的民族成员，在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关系上的真实态度。研究这个问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边疆居民特别是具有跨境民族身份的居民在一般情况下和特殊情况下，是如何体现出国家认同的，或者说在一定时候，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两种认同不一致的情况下，将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表现。

调查方法

对于基本数据的采集，也就是基本调查方法，是通过调查问卷来进行的。

调查地点在云南省与越南、老挝、缅甸相连的边境地区，对象为居住在中国一侧的具有“跨境民族”身份的居民。从云南省边境地区的 8 个州、市共 25 个县中，随机抽取 4 个州市中的 7 个县，23 个村及若干个村民小组，对具有“跨境民族”身份的个体进行访问调查。共发出问卷 400 份。通过调查员直接调查，回收率比较高。回收问卷 400 份，回收率达到 100%。有效问卷 396 份，有效率 99%（无效问卷为汉族个体的问卷，不符合设计的调查对象要求）。

此项调查，是基于对我省边境居民，特别是对我省跨境民族的状况关切而确定的选题。

此项研究所确定的对象有若干限定：一是居住在边境一带。具体要求是有边境线的某一个县；其中的一个乡（镇）；乡（镇）中的一个行政村以及下属的一个自然村。对这个自然村的基本要求是距离边境线最近。二是所调查的对象是跨国境居住的民族（居民），即通常所说的“跨境民族”。三是只调查跨境少数民族，不调查汉族（汉族也有跨境而居的，因此有的学者认为汉族也是“跨境民族”）。

二、“边境居民的国家认同问题”研究的意义和研究方法

研究思路

作为跨境民族，其民族成员与境外的居民属于同一个民族。因此，这一选题中的“国家认同问题”的现实意义将更加突出。因为所研究的对象就是生活于中国一侧的边境居民——云南跨境民族的成员。这些民族与境外的居民有着同源同流同文化的亲缘关系，他们是“同一个民族”。这就产生了国境线两边的民族成员有一个“民族认同”的问题。边境居民——云南跨境民族的成员，就有着“民族成员”和“国家公民”双重身份。前者是民族认同的文化基础；后者是国家认同的宪政前提。那么，在他们身上“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在不同情况下他们的国家认同状况又有什么变化？在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中如何体现出特定的国家认同行为和态度。而着重想调查了解他们的国家认同状况。

居住在边境地区的跨境民族成员，具有“民族成员”和“国家公民”双重身份。在稳定、平和的情况下，没有外来势力的干预，这两重身份是协调一致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两者相安无事；在另外一些情况下，特别是在民族利益受到剥夺，民族感情受到刺激，“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两者之间会出现动荡，引出复杂的问题，“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平衡被打破，产生国家认同危机。而在某些特别的情况下，比如民族极端思想上升或某种外来势力严重干预的时候，两者之间则会出现冲突和矛盾，产生严重后果。

我们此次调查的主要关注点放在边境居民的“国家认同”层面上。其主要考虑的是，跨境边民生活于与另外一个国家接壤的边境一侧，且与境外的同一民族常年往来频繁，互动形式多样。互动内容从生产到生活，包括经济、文化、宗教、娱乐等，从负面的互动来看，有涉毒、涉黄、涉枪、涉艾（滋病）、涉拐（拐卖妇女、拐卖儿童）等活动。跨境居民的互动往往是在民族认同的基础上开展的，而且是跨越国界的互动，这种互动中的负面内容如果增多，或者对民族认同进行不适当的鼓动和刺激，将会影响到对国家的认同，产生对主权国家不利的后果。再加上边境地区远离国家政治中心，一般情况下边民对国家的认同比起内地会有不同程度的淡化。这双重原因的存在，国家认同意识就容易被过强的民族认同因素所制约和遮盖。这也是我们表现观察到的边境居民“国家意识不强”的基本原因所在。

本文研究的对象是云南跨境民族。具体研究内容是云南具有跨境民族特点的边疆居民，通过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两者之间的关系。特别需要关注的是跨境民族特点的边疆居民的国家认同问题。

两个角度研究跨境民族的国家认同问题

这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个是客观的角度；一个是主观的角度。

客观的角度是指：边疆居民所处的客观环境以及由此形成的和所涉及到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问题；主观的角度是指：作为边疆居民的个体，他是活生生地生活在边疆的具体环境中，他对于“民族”和“国家”有自己的一定的认识和一定的态度，以及在有关“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上的自己的看法和表现。而在一定和条件下，在原有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态度乃至行为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客观的条件，也就是构成跨境民族成员的边疆的区位和边疆的生存环境。首先是祖祖辈辈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划定国界”而形成同一民族分属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是我们所看到的“跨境民族”。这就是跨境民族成员生存的环境。这样的区位和环境，是一个民族国家所控制的空间范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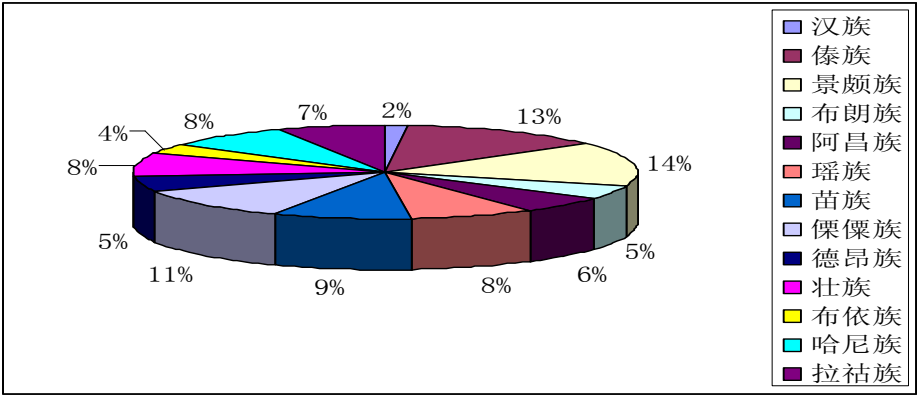
边缘地带，是国家边防的前沿。这一性质决定了这种环境对于一个国家的安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生活于其中的跨境民族成员，由这种环境的造就了他的思想和观念。这种思想和观念，往往在国家边疆问题上，在国家边防问题上，在国家形象问题上，都会产生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主观的态度，是在客观的条件作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是长期生活形成的。

样本情况

在研究方法上，本次调查采用多段抽样、偶遇抽样和雪球抽方法采集数据。然后对采集到的数据使用 SPSS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分析。

首先采用多段抽样的方法，从云南边境 8 个州、市共 25 个县中随机抽取四个州市，分别为保山市、德宏州、红河州、西双版纳州，然后再从这四个州市中抽取边境县中的 7 个县，分别为保山市腾冲县、德宏州潞西市芒市镇、德宏州陇川县、德宏州瑞丽市畹町镇、红河州金平县、红河州河口县、西双版纳州勐腊县。接下来在这 7 个县中抽取共计 23 个村及若干个村民小组的调查对象入户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对象共计 400 人，其中男 230 人，女 170 人，20 岁以下 28 人，21-30 岁 90 人，31-40 岁 107 人，41-50 岁 109 人，50 岁以上 66 人，汉族 6 人，傣族 53 人，景颇族 60 人，布朗族 19 人，阿昌族 23 人，瑶族 32 人，苗族 36 人，傈僳族 21 人，壮族 32 人，布依族 14 人，哈尼族 32 人，拉祜族 28 人。见图一：调查对象民族构成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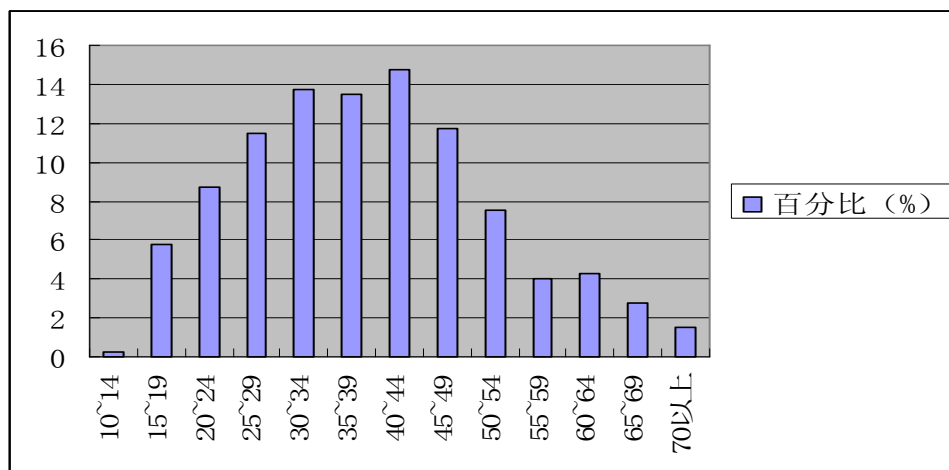
图一：调查对象民族构成图



从此图上可见，这次调查对象的民族构成比重概况。这次对 13 个云南跨境民族（含汉族）展开了调查。所调查民族，在云南 17 个跨境民族（含汉族）中占到了 76.47%。此次调查基本上涵盖了云南边境地区民族的绝大部分，并对云南边境少数民族边民人口众多、分布较广，在不同边境地域表现出差异性认知的傣族、傈僳族、景颇族、苗族、瑶族、壮族展开了重点调查。

由于人的认知水平、认同标准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变化，因此从调查对象的年龄构成上看，本次调查以 20 岁——54 岁这一阶段的年龄群为主体调查对象，这一年龄的样本占总体样本的 81.5%。并对 25 岁—29 岁，30—34 岁，35—39 岁，40—44 岁，45—49 岁的年龄群体进行了着重考察，在此基础上，同时兼顾了 55 岁以上年龄群体的看法和认知。见图二：调查对象年龄构成图。

图二：调查对象年龄构成图



由于生活在云南边境一带的少数民族经商人员边民主要以务农为生，因此，在调查对象中农民占了 87%。同时兼顾部分当地经商人员、公务人员、教师、学生等其它群体的意见。

本次调查，调查对象的住家离国境线的距离最远的是 80 公里，最近的，住家就建盖在国境线上。被访问者当中，住家离国境线 0.5 公里以下的就有 47 户，占调查对象总数的 11.75%。

三、云南跨境民族的国家认同现状

“国家认同”具体指标的试验性设立

在衡量国家认同这一具体指标时，我们设计了这样的指标进行测量：“您认为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高，是否对本国居民有吸引力”？对此持肯定回答的高达 90%（360 人），否定回答的仅占 1%（4 人）。在“经济发展水平高一些是否有利于自己国家国民的认同”的测量中，回答“是”的占 78.5%（314 人），回答“否”（3 人）、“不一定（9 人）”和“说不清”（68 人）三项加起来，仅占 20%（80 人）。

在云南边境地区，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的好坏，往往会引发两国边境地区人员的迁徙和流动，一般是从经济落后的地区向经济生活较好的地方迁移。在我们所调查的中缅、中老、中越边境地区，这种现象都普遍存在，尤其是在中缅边境地区这种现象尤为突出。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我国国内政治斗争的原因，加上经济状况不善，不少当时边境地区的居民举家迁移到了邻国。到八十年代中后期以后，随着我国政治状况的不断好转和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很多外迁的边境居民又迁回到中国来居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经济水平的发展壮大，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吸引了外迁居民的回归。同时也有一部分邻国的边境居民，由于他们看到我国经济条件的优越性和生活水平越来越好，都举家迁入了我国的边境地区。这也是经济发展起来之后，国家实力增强，自然就有了吸引力。

在回答“您知道中国国家主席、云南省省长、咱们州州长（市长）、县长、乡长（镇长）、村长的名字吗”？基本上，大部分的调查对象能说出国家主席和本村的村长，知道“两头”，不知道“中间”。“两头”就是最高领导——国家主席和最基层的领导——村长。“中间”就是介于这“两头”之间的省长、州长（市长）、县长和乡镇长。调查数据说明：有七成以上的访问对象都知道中国的国家主席。在一个哈尼族村子里，一位三个孩子的中年妇女还特意把电视打开，找到

新闻频道，告诉我们“这就是胡锦涛主席”。另外大约有六成和九成的人知道乡长（镇长）和村长。能勉强说出省长、州长和县长的只是极少数当地有着政府工作背景的人和知识分子。造成这一认识的因素，有边境居民的自身文化素质制约着对国家政治生活的认识和了解，对国家主席和村长认知程度最高。对国家主席，是在电视上经常看到；对村长，是生活中经常在一。这也反映了边境居民的经济条件有了提高——电视机比较普及，也反映了与群众直接相关的人最易被他们认识——村长就是这样的人。

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我们曾主观地设想，边境居民对相邻国家的领导人是否也会知道？便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您知道邻国领导人的名字吗”？回答“不知道”的 344 人，占 86%，回答“知道”的 21 人，占 5.25%。这又从相反的方面说明边境居民对自己国家认识程度。这不应仅仅看成是长期宣传的结果。我们宁肯将其看作是国家认同的一个基础。

跨国婚姻的数据的意义

考虑云南边境少数民族居民存在着跨国婚姻的情况，因此，此次调查也对这方面的情况进行了了解。从调查对象的配偶国籍来看，跨国婚姻在所调查的对象样本中并非主体婚姻模式，但比重较大，远远超出非边境地区。其中，配偶国籍缅甸为 15 人，老挝 7 人，越南 3 人，不明国籍 33 人。据我们从不同方面了解，“不明国籍”中，绝大部分是非中国籍，只是当事人过于“糊涂”，连配偶的国籍都不知道就结婚了。

这种现象的存在，一方面说明：边境地区的一些居民确实对于国家观念、法制观念是相当淡漠的，而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证明了：跨国婚姻人群中的民族认同感在潜移默化起作用的（配偶基本上是与自己同一民族）；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边境地区加强国家体制性的建设还任重道远。上述四组数据共 58 人，占调查对象的 14.5%。如果我们将这组数据放到调查对象中已婚人数 361 人（包括“已婚”348，“离婚”1 人，“丧偶”12 人），除去“不明”1 人，“未婚”38 人，这样，跨国婚姻人数在已婚人群中的比重达到 16%。这种跨国婚姻，在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方面必然产生一定的影响。

特别应当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边境地区的非法跨国婚姻现象非常突出。由这些非法婚姻带来的问题，包括妇女的社会地位和法律权益保障问题、后代的教育和成长问题、家庭成员的户籍问题、相关的外事问题等一系列问题。对此，我们将另外写报告进行专题反映。

四、对云南边境居民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一些初步看法

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爱国主义，这些概念都有一个共性，即比较抽象。为了使这些比较抽象的、主观性的概念成为实实在在的研究内容，并且得出可信的结论，我们课题组不仅在研究方法上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制定的较为科学有效的数据获取途径，以及分析方法。以一处实证的手段进行研究，有了一系列新的发现，初步提出一些研究看法。

在调查对象中距离国境线 5 公里以下的人家占调查对象中 36.6%，调查对象距离国境线 5 公里——9.9 公里的人家占调查对象的 18.13%。调查对象距离国境线 25 公里以下的有 309 人，占调查对象总数的 77.25%。调查对象距离国境线较近，也体现课题调研选点的一个考虑：离国境线近，边民与相邻国家民族的互动条件较充分，这就便于调查者了解跨国境社会互动的真实情况，也便于了解和掌握边民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上的关系变动情况。

——自己的国家发展和壮大，就必然产生吸引力和向心力。这一判断是从边境居民的跨境民族身份来讲的。因为这样的判断并不适合内地的居民。

我们的调查中就有这样的题,对此持肯定回答的高达 90% (360 人),否定回答的仅占 1% (4 人)。在“经济发展水平高一些是否有利于自己国家国民的认同”一题中,回答“是”的占 78.5% (314 人),回答“否”(3 人)、“不一定(9 人)”和“说不清”(68 人)三项加起来,仅占 20% (80 人)。

这也说明边民对自己国家还是有一个客观认识的。联系到上述所分析的跨境婚姻问题,又从一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边民生活和态度的真实状况:一方面他们从实际出发决定自己的行为 and 态度,一方面他们也不会抽象谈论和认识“爱国”问题。同时,也真实地体现了发展壮大中的国家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

——跨国非法婚姻的存在,从一个侧面说明,在相当一部分人当中国家观念的淡漠(如不知配偶国籍),民族认同意识较强(如要求配偶与自己同一民族)。但另一个方面,我们也

——在与国家认同有着较强关联的一个问题是:“您认为台湾与大陆应当统一吗”?在回答者当中,选择“不知道”的调查对象最多,共有 176 人,占调查总数的 44%。这些回答者多数为中老年妇女;其次为“应该”的,共有 139 人,占调查总数的 34.75%;再次选择“非常应该”的为 71 人,占调查总数的 17.75%;选择“无所谓”的为 5 人,占调查总数的 1.25%;选择“不应该”的为 3 人,占调查总数的 0.75%。未作回答的为 6 人,占调查总数的 1.5%。

选择此问题作为边境地区居民的问卷调查问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边境居民对台湾认识,以及对国家统一的态度。但因为此问题与调查对象中的大多数人(农民,妇女,缺少文化),在调查中有 44% 的被调查者“不知道”。另外约有一半以上的调查者认为,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固有的领土,台湾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现在居住在台湾的人也都是中国内地陆续迁过去的,所以台湾与大陆应该是要统一的,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也是一家人。知道台湾的边民,都认为台湾应该和大陆统一。

——“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建构起来的。这所以这样讲,是在正常情况下,没有外力和特殊原因的进入,边境居民的生活中是没有“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问题的,更不存在此两者当中非此即彼的问题。但是,作为一种研究,提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却是有着重要意义的。它不仅有着理论上的价值,在实际研究中也有相当明显的运用价值。我们在“边境居民的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对云南跨境民族的一项实证研究”的项目申请获准,以及实施调查的过程中,也深深感受到这种价值。同时,它还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这种方法论的作用正是产生研究成果和相关理论的必要前提。将其作为科学方法来运用,就会产生科学的成果。

这里还涉及到一个边民的“爱国问题”。“爱国”,作为一种对自己国家正面肯定的态度和行为的指称,其实是非常具体的。真正的爱国用不着刻意地去表现,而是在日常生活和最一般的行为中表现出来。尤其对远离国家政治中心,而且还处于与另外一个国家最近的国境线附近的居民来说,他们以自己的日常生活活动表达了对自己国家的自然热爱的态度。

爱国是一个政治道德问题。但边境居民的生活,如果不是特别涉及政治道德方面的事件,他们的爱国就不是外在地表现在一些政治口号和抽象的表达上,而是内在地反映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

在前文所述及的非法跨国婚姻现象存在的问题,本身就说明边境地区的一些居民的国家观念的淡漠,而同时也证明了跨国婚姻(非法、合法)人群中的民族认同感在潜移默化起作用的,如配偶基本上是与自己同一民族)。这就提出一个任务:加强边境地区的国家体制性的建设。而不仅仅是抽象地宣传“爱国主义”。如果只是抽象宣传“爱国主义”,会给人一种假像:政治上好象接受了“爱国主义”,而实际上,有大量的现实生活问题是与“爱国主义”无关的,边境居民会

以自己最常见的方式和最真诚的态度去决定自己应当怎么去做。

当然，我们说一些边境居民的“国家观念的淡漠”，根本原因是反映了他们的日常真实生活。在这样的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生活中，并没有没有出现让他们的国家观念得到强烈表达的机会。因此，不能简单地由边境居民的跨国婚姻现象来判断当事人是否“爱国”。因为“爱国”更多地是一种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而婚姻本身并不是政治态度，也不是政治行为。在这一点上，就象一些演艺明星和体育明星加入某国国籍，不能由此判定其是否“爱国”；也不能以是否购买中国商品来判断是否“爱国”的道理相似。

我们在调查问卷中有这样一个题，调查“咱们这里有人与境外的人结婚吗？”回答“有”的 292 人，占到调查对象总数的 73%。这样高的一个比例，又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跨国婚姻在边境地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至少，在当地人看来这并不是一件值得惊奇的事情。我们已经注意到，这种情况在边境一线有一定的普遍性，不论在中老边境，还是在中越边境、中缅边境，都一定程度地存在。形成这种情况的基本原因有两点：一点是空间位置所决定的边境居民的生存环境，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与境外同一个民族的成员频繁往来，交流互动的内容已经深入到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第二点，因为边境两侧都同属一个民族，“同文同种”和共同的历史，造成他们在态度和行为方面的经常性的生活认同一致。使他们在文化认同 / 民族认同上有一种的自然的不言而喻的选择，而在宪政认同 / 国家认同方面显得较为迟钝和淡漠。以上这两点，是客观存在的。但有一点必要的说明：这种情况在经济条件相对落后，交通和通讯条件相对缺少的农村更为明显。而在经济文化较发达，通讯和交通条件较好的地方则不明显。《边境居民的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对云南跨境民族的一项实证研究》的大量数据也能够证实这一点。

附注：本文是在“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研究项目”（“2008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特别项目”，项目编号：A08008）《边境居民的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对云南跨境民族的一项实证研究》成果基础上撰写的。项目主持人为李立纲。参加调查和研究的有：博士李永松、谷禾；在读博士李树燕、庄弘泰；硕士赵煜、段岩娜、安金德、苏紫阳、白晓明；在读硕士戴青卿、赵越等。）

联系人：李立纲，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员

通讯地址：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云南省昆明市环城西路 577 号）

文章来源：作者投稿

中国社会学网 www.sociology.cass.cn